

专 题

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 卡拉·弗里曼

内容提要：面对国际秩序的快速变化，美国的决策圈期盼一个以奥巴马主义为标签的大战略，以便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并通过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来提升和发展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美国的“战略转向”或对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具有地域战略的意味，其中争议性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对待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在发展中国的伙伴关系，以便实现互利和寻求解决全球问题之道，同时面临许多挑战。由于国际条件和国内政治的多重限制，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二任期中有可能会放弃制定一个大战略的努力。

关键词：奥巴马主义 大战略 再平衡 中美关系

当今国际秩序变化的速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极地冰盖融化的速度，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政策圈中再现呼声，要求出台一个新的美国大战略，即一幅能够指引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新的战略路线图。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的角色变化固然是引发这些呼声的重要诱因，但与此同时，美国战略关切的另一关键目标，则是世界经济与军事平衡正向以崛起中的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倾斜。奥巴马总统被寄予厚望，众人期待一个基于“奥巴马主义”的新的战略愿景能使美国重整旗鼓，恢复其在当下国际变化中引领方向、塑造时局的影响与能力。然而，是否存在一个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奥巴马主义”及与之相应的大战略呢？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它将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将美中关

〔美〕卡拉·弗里曼博士（Dr. Carla Freeman）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Th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中国研究系副主任、副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The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执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

系纳入正在演变的奥巴马大战略中？

寻找“奥巴马主义”

2008年，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奥巴马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登上了竞选舞台，几乎是从那一刻起，对“奥巴马主义”及一个新的美国大战略的求索就已开始。对新领导人提出的外交政策新愿景，厌战的选民们表现出了乐于接受的姿态：早前，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反思此前美国政策时的评论中，将小布什任期内的美国称为热衷于在海外四处干涉的“美利坚帝国”，¹而新愿景则将改变这一形象，使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介入（engagement）更为克制。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际角色问题就成了竞选中的关键议题。在总统大选中，这一议题主要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承诺相关，然而，它不仅仅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竞争中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成为争取获得党内提名的民主党内候选人间竞争的焦点所在。候选人奥巴马在2007年7—8月刊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一文，该文被广泛视为对即将可能出台的“奥巴马主义”的初步阐述，而“奥巴马主义”则被预期会塑造其任内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在文中，奥巴马强烈抨击了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认为这一决定完全是由“错误的国际事务观误导”所致。与此相对，他提出了美国政策的另一种愿景，在此种情况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世界享有共同的安全和福祉”。²一些分析家认为，奥巴马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其领导下的美国将不再像从前那样强调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另一些人的观点则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这恰恰是一种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宣言，并且与奥巴马在其他外交事务上的公开观点是相一致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到，当年在参议院发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言论时，奥巴马所使用的语言远非是反干涉主义的。相反，他如此阐释自己的立场：“（我）反对无力的战争，或是轻率发动的战争。（我）反对基于情绪而非理性、基于政治而非原则的战争。”³奥巴马的拥护者声称，“奥巴马主义”将有助于美国摆脱单边主义和赤裸裸地追求霸权的形象，转而通过符合自

1 George Liska, *Imperial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Primacy*, The Washington Center of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A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2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 1, 2007, Web, 30 Mar 2013,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2636/barack-obama/renewing-american-leadership>.

3 See, for example, Brendan O'Neill,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Hope,"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28 Feb 2008,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make-the-world-safe-for-hope/>, For quote from Obama's 2002 speech, see "Transcript: Obama's Speech Against The Iraq War," *NPR*, October 2, 2013,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9591469>.

“奥巴马主义”
将有助于美国摆脱单边主义和赤裸裸地追求霸权的形象，转
而通过符合自由国际主义优良传统的“开明的全球领导力”
(enlightened global leadership) 来提升美国的利益。

由国际主义优良传统的“开明的全球领导力”(enlightened global leadership) 来提升美国的利益。¹ 在此后不久的2009年春，总统又从索马里海盗手中营救了理查德·菲利普斯船长(Captain Richard Phillips)，这一决定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宣称，奥巴马主义已经诞生了。专栏作家E. J. 迪翁(E. J. Dionne)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将奥巴马主义称作“是某种形式的现实主义，它并不惧于使用美国本国的权力，但同时又谨记，在运用权力时必须受制于现实约束，并时时保有自知之明”。²

然而，早在奥巴马政府上任还不满一年时，就有观察者对正在形成中的“奥巴马主义”产生了疑问。在他们看来，以一种宏伟愿景的方式来阐释这一主义收效甚微，与其如此，是否还不如提出一系列使用武力的具体准则，就如奥巴马在批判其前任留下的战争和反恐政策时所做的那样。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时，奥巴马提出了部分的具体准则：武力可以用于自卫；武力可以用于反对侵略者；武力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使用；武力的使用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³ 2010年5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对小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战略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其中提到：“尽管有时使用武力是必要的，然而在发动战争之前，我们必将穷尽其他一切可能的选择……当有必要使用武力时，我们将以能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并强化我们的合法性的方式(来使用它)，并且努力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同时该文件也指出，尽管美国将会“致力于遵守使用武力的规则”，可是美国仍然“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以便保卫自身的国家和利益……”⁴ 这确是一种主义，然而正如此后一名常就奥巴马政府大战略发表评论的评论员所说，这种主义缺乏一个大战略所必须具备的政策内容。⁵

1 Spencer Ackerman,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merican Prospect*, March 19, 2008, <http://prospect.org/article/obama-doctrine>.

2 E.J. Dionne, Jr., "The Obama Doctrine in A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16 April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4/15/AR2009041502902.html>.

3 "Obama Defends War as He Picks up Nobel Peace Prize," *BBC News*, December 10, 2009, <http://news.bbc.co.uk/2/hi/8405033.stm>.

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5 Daniel W. Drezner, "Let's Define Our Foreign Policy Terms, Shall We?," *Foreign Policy*, March 29, 2011, http://drezner.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3/29/lets_define_our_terms_shall_we.

美国的战略“转向”：大战略还是政治战略？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一种关于奥巴马大战略的新选择。按照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的定义，大战略是一种能够反映“手段与宏观目标之间经过审慎计算的关系”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然而另一些人对大战略的看法并不符合加迪斯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奥巴马政府向亚洲的战略“转移”——这一说法在提出之后就立即被纠正为向亚洲的“再平衡”，但这一改口并不成功——即可被视为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大战略，或者说构成大战略的某些元素。这一转移包含了地缘战略层面的含义：重新系统性地聚焦于亚太这一世界范围内最具经济活力、并集聚了众多军事力量的地区。美国在该地区保持本国优势地位的目标，同时加强与该地区经济交往及外交与安全联系的手段，两者之间似乎也是互相关联的。美国所采取的首要措施可分为经济层面以及安全与外交层面两个方面：前者即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后者包括加入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郑重承诺美国在削减军事开支的同时仍会恪守诺言、承担在该地区的军事义务，达成首次将海军陆战队派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Darwin）的协议，以及全面深入地参与亚太地区的区域性论坛。

这一转移包含了
地缘战略层面的含
义：重新系统性地聚
焦于亚太这一世界范
围内最具经济活力、
并集聚了众多军事力
量的地区。

奥巴马政府在该地区采取的如上举措，与其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或曰“再平衡”相关。然而，这一转移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处理国际事务时目标与手段间的经过“审慎计算”的关系，却并不十分明晰——若我们将“手段”定义为资源的话，就更是如此。2011年11月，克林顿国务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文，从而提出了战略转移。然而，某些如今被视为战略的举措在此前的一些政策声明与行动中就已初现端倪。这些声明与行动早在战略转移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中包括：改变小布什政府时期减少驻韩美军数量的政策，与越南和柬埔寨展开海军方面的合作，以及2010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就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争端所发表的宣言。这也使得批评者认为，所谓战略转移，主要仍是一种事后的努力，旨在使美国的一系列被动的反应措施能够应对该地区的发展和倡议。

此外，这一转移对美国的安全利益和预算开支所可能造成的代价也引发了忧虑，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能力是否足以使其恪守承诺，另一些人甚至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做出这些承诺。¹《福布斯》杂志的一位评论员对美国的政策做了如下反

1 Robert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211/robert-s-ross/the-problem-with-the-pivot?page=show>.

思：“遏制中国的负担日益沉重，而对我们盟友的‘再保障’政策迫使美国在这日益沉重的负担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尽管如此，……却还从来都没有人详细地说明过，即使出现了一个在军事上十分强大的中国，美国的国家安全究竟将会受到怎样的直接威胁。”¹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专家将战略转移称为是因应削减军事开支的计划而提出的“希望战略”（strategy of hope），他们说：“如果还想要维持当前水平的对外军事承诺，那么认为美国能够承受这1万亿美元国防开支削减的一半（即5000亿美元）都是不现实的，再说这1万亿美元的削减也还没有通过国会的批准。更不用说想要进一步增加对外军事承诺了……”² 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研究部的报告也将守信问题作为重要关切提出来，报告中提到，在奥巴马政府2013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建议将在亚太地区双边互助项目中的投入削减5%，相对在其他地区的削减而言，这并不算多，然而对于该地区的伙伴而言，也仍然构成了一个“模糊的信号”。报告进一步指出：“尽管奥巴马政府此后很快用‘再平衡’代替了原本提出的‘转移’，然而‘转移’一词仍然被沿用了下来，并且这个词本身就可能标志着美国政策优先性的易变性……如果美国可以转移一次，那么或许一旦继任的政府给予其他政策目标以优先权，就会有再一次的转移。”³

战略转移在美国大选的前夕提出，这在国内政治层面上有着清晰的逻辑，因而也使其引发了推测，即奥巴马总统之所以热衷于推广这一动议，可能主要是出于大选即将来临的国内政治考虑。它成功地引导了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关注到，在当今全球经济形势最好的地方，美国拥有不断拓展的贸易与投资机遇。对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批评在竞选过程中日渐升温，在此情况下，战略转移中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倡议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恰是一个机会，能够借此来展示本政府的举措及其成效，其中便包括和韩国新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也是美国在这一充满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与中国以外的市场拓展经济联系所迈出的一步。此外，战略转移也使防务费用的重点有所转变：此前10年中，美国在海外发动了众多战争，如今在众望已久的战事渐息的背景之下，这一转移也缓解了削减防务开支所可能带来的冲击以及撤军对预算所造成的压力。正如代表美国主要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企业的贸易协会——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AIA, or Aerospace Industries Association）的总裁所评价的那样，这“为我

1 Stephen Harner, "The Asia Pivot, Our Dysfunctional China Policy, Japan and the Upcoming Abe-Obama Summit," *Forbes*, January 29,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3/01/29/the-asia-pivot-our-dysfunctional-china-policy-japan-and-the-upcoming-abe-obama-summit/>.

2 Bruce Klingner and Dean Cheng, "U.S. Asian Policy: America's Security Commitment to Asia Needs More Force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Number 2715, August 7, 2012,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2/08/americas-security-commitment-to-asia-needs-more-forces>.

3 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28, 2012, <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

们的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帮助我们装备我们的朋友”。¹ 此外，正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注意到的，美国向亚洲的再聚焦也使总统能在阿拉伯之春的时代到来之际，对其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与人权议程给予更多的关注。² 这其中包括与印度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以及与缅甸关系的逐步正常化，以便支持该国正在发生的政治自由化的新进展。

然而，这一战略转向对美国的大战略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其焦点在于这一转移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早在上任之初，奥巴马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在他任期之内，一个主导性的地缘战略关注点便是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在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在内的奥巴马团队亚洲政策小组为新政府拟定政策规划之时，他们便努力设计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以便确保中国以一种维护国际规范的方式崛起，同时他们也致力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以使中国的崛起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而非构成该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³ 举例而言，2009年7月，奥巴马总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就中美关系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中美两国的“伙伴关系”将“塑造21世纪”，并称，“我们应当携手共同行动，根据常识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⁴ 这一表述恰恰呼应了奥巴马在竞选之时对促进“共同的安全”与“共同的繁荣”的强调，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寻求国际稳定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自身利益，都必须以此为指导方针。⁵

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努力想使中国官员确信，这一转移（或曰“再平衡”）并非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可是在中方看来，这一转移标志着美国欲将两国关系从友好的方式向全面竞争的框架转变，事实证明，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这一想法十分困难。此外，在中国看来，这一举措只可能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的（再）评估，且评估的结论便是中国实力的增加与美国的利益将是相互对抗的。在奥巴马上任后的第二年，总统及其高级官员对华言论的调子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使中方进一步确信，美国有意对北京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政策，并且这一观点

1 "US 'Asia Pivot' Aimed at Containing China," *PressTV*, January 3, 2013, <http://www.presstv.ir/usdetail/281517.html>; see also as example of commentary, "The United States Is Planning An Asian Pivot While Leaning On A Broken Crutch," *Asylum Watch (blog)*, <http://conservativesonfire.wordpress.com/2013/01/31/the-united-states-is-planning-an-asian-pivot-while-leaning-on-a-broken-crutch/>.

2 Kenneth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Why President Obama's Turn to the Eas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1/the_american_pivot_to_asia?page=0,1.

3 Paraphrase of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n America's Asia Strateg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2012.

4 Kevin Hechtkopf, "Text: Obama's Speech on US-China Relations," *CBS News*, July 27, 2009, 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5190916-503544.html.

5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Debate on NP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2/04/us/politics/04transcript-debate.html?pagewanted=all>.

在中方的观察者中拥有很广泛的市场。上文曾提及,2010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在河内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上发表了讲话,而这一关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讲话,便是这种论调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¹此外,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首尔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所发表的关于朝鲜的讲话也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²对于华盛顿方面的意图究竟是否善意无害,北京方面一直保持怀疑。美国不仅对其长期以来的盟友、同时也对该地区的新伙伴做出承诺,称会维持并加强双方的防卫合作,但其中的许多国家与中国共享着漫长的国界线,并向来关系紧张,加之在该地区被克林顿国务卿称之为“前沿部署外交”³的政策也将许多中国的邻国包括在内,这些都加深了中国方面的疑虑。在中方看来,美国不仅意欲平衡,并且是要制衡甚至破坏中国在这一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一些美国的观察家将这一转移置于大战略的背景下来考察,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反映了总统在宏观战略层面的一种重新建构,而这种改变,或许与更多得益于克林顿国务卿的领导的外交政策是相一致的。原本美方的学说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协作式接触(collaborative engagement)既被视作是一种战略手段,同时也被视为是目标。但是现在,它似乎已向另一种观点转移,这种新观点认为,国家之间是为了应对其所感知到的共同威胁而向着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仅仅是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已经很难构成促成合作的充分动机了。在伊朗问题上,奥巴马先是提出,“若你们愿意松开攥紧的拳头,我们就愿意伸出我们的手”,然而这一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够成功地为促进双边关系打开大门。此后,由于两国之间嫌隙日增,并且对美国而言采取强硬策略的经济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原本通过外交方式来处理两国关系的努力便向对伊朗的胁迫政策转变。

与此不同的是,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若对中国采取任何形式的胁迫行为,所造成的即时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将是高昂的。中美两国的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高度依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中国也同样会从其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中获利。同时,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除此而外,尽管在许多美国视为优先的议题上,尤其是那些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海上安全、航空航天以及“全球零核”与网络安全等,中国进行合作的意愿之微弱与展开合作的步伐之谨慎都

1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Hanoi, Vietnam, July 23,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2 Mark Landler, "Obama's Journey to Tougher Tack on a Rising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9/21/us/politics/obamas-evolution-to-a-tougher-line-on-china.html?pagewanted=all>.

3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Honolulu, Hawaii, October 28,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41.htm>.

可能会让美国深感沮丧,但无论美国多么沮丧,鉴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重要性,若不与中国进行深入的合作,美国都将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也无法实现涉及这些议题的有效的全球合作。

最为强硬的观察者可能会希望,美国的这一转移是预示着“历史的重现”,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被认为对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采取强硬政策。然而鉴于以上的原因,大多数人仍然将这一转移视为是一种“两面下注”(hedging)的行为。依照这种传统战略,美国一方面会与中国保持稳健的经济联系,同时深化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建立广泛的关系网并进行军事筹划,以为来自中国的可能的侵略而未雨绸缪。¹然而,想要实施这样一种政策,即试图一面提升美国击败一个国家的相对能力,同时又要努力与之发展伙伴关系,以便实现互利和寻求解决全球问题之道,美国就不得不面临许多挑战。因此,当美国想方设法欲使中国参与到保护全球公海安全的事业中来时,中国充满疑心的回应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²甚至有一些中国学界的分析认为,美国做出这样的姿态是一个阴谋,而其目的就在于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³

想要实施这样一种政策,即试图一面提升美国击败一个国家的相对能力,同时又要努力与之发展伙伴关系,以便实现互利和寻求解决全球问题之道,美国就不得不面临许多挑战。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大战略

目前,奥巴马已经开始了他作为总统的第二任期,关于奥巴马政府将如何调和战略转移中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背景仍在于经济发展受制、财政预算受限以及持续的党争所导致的严酷现实,这使得政府在国内政策层面很难有所作为,同时,这一境况在对外政策层面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许多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还有能力维持其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从狭义上而言,这一争论试图探讨的是,战略转移是否应当并且是否将会被作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大战略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执行;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其所探讨的事实上乃是,作为一个为美国全球角色定位的战略,究竟应以美国对全

1 James Kitfield, "Is Obama's 'Pivot to Asia' Really a Hedge Against China?" *The Atlantic*, June 8, 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06/is-obamas-pivot-to-asia-really-a-hedge-against-china/258279/>.

2 Andrew S. Erickson, "New U.S. Maritime Strategy: Initial Chinese Response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4, Autumn 2007, http://www.chinasecurity.u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Itemid=8.

3 参见曹升生、夏玉清:《全球公域成为新式美国霸权理论》,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9月刊,第19卷,第9期。

球安全领域的全方位介入为目标，还是应以更有选择性的介入为目标。最后，尽管围绕奥巴马政府大战略的讨论不断升温，但有一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考虑到国内外两方面的原因，究竟是否会有这样一个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产生。

在总结2012年大选前夕围绕大战略及美国的全球角色所展开的讨论时，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这一讨论主要反映的是两派观点之间的不合：一派以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代表，他们主张美国应当“深度接触”（deep engagement）；另一派则主张美国应当有选择性地接触（selective American engagement），沃尔特本人即持后一种观点。¹ 艾肯伯里与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及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曾联合撰文，论证美国为何能够并且应当追求（或维持）一种“深度接触的大战略”。在文中，他们提出了美国能从这一大战略中获益的三个方面：首先，在他们看来，美国在海外的安全承诺不仅有助于“制衡潜在对手”，同时也有助于降低世界重要地区内的竞争烈度；其次，他们认为，这一战略使得美国能够“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作者在文中提及美国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对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充满期待，在他们看来，这些举措都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在经济谈判中的影响力。最后，他们声称，深度介入战略使得美国在应对全球性威胁时更易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并能进而左右这种合作，使其更多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² 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为了反驳包括沃尔特和巴里·珀森（Barry Posen）在内的一种更为内向型战略的提倡者的论点。艾肯伯里等人将对手的主张称之为“收缩”（retrenchment），并与之划清界限，而在沃尔特看来，这是一种“接触”（engagement）或曰“有所克制的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y），相比“深度接触”，它主张的是更有限的介入国际事务。珀森抨击了美国无止境的“霸权追求”，在他看来，美国应当以一种“经过审慎计算并有所取舍”的方式来应对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包括将安全防务的负担更广泛地分派给美国的盟友与伙伴，一方面加强合作，确保在危机之时美国能够进入相关地区，同时另一方面也要使美国的伙伴们明白，他们应当“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并发展相关的政治和外交机制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珀森说，现在美国的朋友都是“无利之交”——美国慷慨解囊，伙伴们搭便车，美国是在为安全领域内的“富人的福利”买单。³

1 Stephen M. Walt, "More or Less: The Debate on U.S. Grand Strategy," January 2, 2013, *Foreign Policy*, 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1/02/more_or_less_the_debate_on_us_grand_strategy.

2 Stephen G. Brooks, and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Lean Forward,"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30, 201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468/stephen-g-brooks-g-john-ikenberry-and-william-c-wohlforth/lean-forward?page=show>.

3 Barry R. Posen, "Pull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 2013,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466/barry-r-posen/pull-back?page=show>.

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的战略转移都是这一辩论的核心所在。对于辩论双方而言,亚太地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对主张“有所克制的大战略”的一方而言,珀森所批评的对美国而言维持代价太过高昂的不少同盟关系都集中在这一地区。与此同时,在珀森所提出的美国应优先考虑的战略议题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防止全球均势被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所颠覆”,而此处所说的对手,在目前看来似乎非中国莫属。在主张美国应当“深度介入”者看来,美国方面任何的“收缩”都将引发“中国方面导致形势不稳定的反应”,同时还将使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更快地增加军事预算,从而“削弱美国在军事能力方面的优势”。¹ 珀森认为,尽管为了处理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相关议题,美国必须与该地区加强合作,因而将保持在该地区的存在,然而对美国而言,首要的任务之一便是要使中国淡化将美国视作威胁的观念。珀森表示,在他看来,当下美国的行为反映出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但这样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导致不安全的产生;只有在面临着切实存在的威胁时,美国才应当有选择性地采取外向型的前沿战略。² 他的批评者反击道,“深度介入”是把崛起中的霸权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损失通过事先努力降到最低的一大利器,他们同时声称,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了”。因此,在他们看来,“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美国应当从阿富汗与伊拉克抽身,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时转向亚洲……这也正是奥巴马政府正在做的事情”。³

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的战略转移都是这一辩论的核心所在。对于辩论双方而言,亚太地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在开始第二任期的工作之时,奥巴马政府本身在这一场辩论中又持何种立场呢?奥巴马十分幸运,在其开始第二任期之时,就已配备了一支经验十分丰富的外交政策团队。在他的团队中不仅有资深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以及一位积极广泛地参与了外交政策制定的副总统,还有曾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及同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事务委员会和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过职的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一位评论员在获悉总统新团队的名单后评论道,这是一支“导师团队”。⁴ 拜登、克里和哈格尔都是总统的长辈,并且他们三人基本都主张对武力的使用应当有所限制,对于克里和哈格尔而言,他们的这种立场可能源于其本人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

1 Brooks et al., Ibid.

2 Posen, Ibid.

3 Brooks et al., Ibid.

4 Michael Hirsch, "What Obama's Senate Mafia Means for America," *National Journal*, January 6, 2013, <http://www.nationaljournal.com/nationalsecurity/what-obama-s-senate-mafia-means-for-america-20130106>.

早在奥巴马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任期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奥巴马政府在努力寻求机会，对调整外交政策的各种可能性进行考量与评估。当奥巴马在组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团队之时，不少高层官员的言论与行为都似乎力图与希拉里时期的国务院政策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期给新政府以一定的空间，以便其能够转离此前的战略转移和“深度介入”的行为方式。在就其出任国务卿而举行的听证会上，克里开门见山地谈到了战略转移的问题，他说：“对于下一步应该怎样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周全。”他认为，美国的战略转移会引起中国的忧虑，促使其质疑“美国正在做什么？他们是想要包围我们。事态正在怎样发展？”他接着说道：“并且大家都知道，每一个行为都会招致一定的反应……这不仅是一条物理学定律，同时也是政治与外交运作的规律。……无论我们在中国或远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不应以破坏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关系为代价。我们必须深思熟虑，避免在原本不存在威胁的地方人为地制造威胁，并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促进合作的基础的问题。”¹此后，在其作为国务卿首次出国访问并到达欧洲时，有媒体就美国的战略转移向克里提问，克里的回应表现出他对此并不以为意：“以前，你知道，大家把它叫做转移，对吧？我们的确很关注亚洲……但我们绝对不是想要以牺牲欧洲的方式来这么做，绝对不是。”²

副总统拜登也与克里保持了一致的步调，在那一年中，他也尽其努力使美国的欧洲盟友能够安心。在2月份于慕尼黑召开的安全会议上，拜登在发言中将欧洲称为“（美国）介入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石以及全球合作的催化剂”。³与此相似，哈格尔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初，就出台了一份战略评估，其中就包括对战略转移的评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防部于2013年4月中旬所提交的2014财政年度的预算申请中，战略转移仍然被包含在了重点之中）。⁴从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团队中所有成员的发言都可以看出，他们更愿意接触中国，而不是同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即使是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就美国亚洲政策的安全层面发表言论的哈格尔，在几年前也公开表示，在美国，中国的话题已经“过热”了。他呼吁大家不要过多地强调军事竞争，同时呼吁追求对中国的渐进介入，以期深化同中国

1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olds Confirmation Hearing on the Nomination of Massachusetts Democratic Sen. John Kerry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4, 2013, www.lawfareblog.com/wp.../01/Kerry-Confirmation-Testimony.pdf.

2 Patrick Goodenough, "In Europe, Kerry Says U.S. 'Pivot' to Asia Won't Come at Europe's Expense," *CNSNews.com*, February 27, 2013, <http://cnsnews.com/news/article/europe-kerry-says-us-pivot-asia-wont-come-europes-expense>.

3 Steven Beardsley, "Biden Calls Europe 'the Cornerstone' of US Foreign Policy," *Stars and Stripes*, February 2, 2013, <http://www.stripes.com/news/europe/biden-calls-europe-the-cornerstone-of-us-foreign-policy-1.206239>.

4 "Defense Budget Priorities and Choices: Fiscal Year 2014," April 2013, <http://www.defense.gov/pubs/DefenseBudgetPrioritiesChoicesFiscalYear2014.pdf>.

的基于“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地缘政治共同利益”的关系。¹此外,早期迹象表明,美国开始努力转移围绕战略转移的探讨的关注点,将其引向朝鲜对地区稳定的挑战,通过这一种手法,美国使自己看起来对战略转移并没那么“乐在其中”,并且使得这一转移政策能够服务于地区安全利益,其中就包括某些中美两国共同关心的特殊领域。

奥巴马政府这一新的外交政策团队的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目标,那就是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赖以依靠的外交政策遗产。一位观察家认为,他们集中关注的目标有两个,其一是恢复美国的声誉,其二是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²以上这些都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者似乎更倾向于一个“有所克制的大战略”,而非“深度介入”的战略。尽管早期迹象显示,围绕战略转移存在着许多的反思,然而要想使美国的政策朝着“有所克制的大战略”的方向发展,也是异常困难的。一种从世界事务中抽身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美国公众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那里,都是不会受到欢迎的。在国际层面,美国也会面临众多的挑战,叙利亚只是测试华盛顿的克制能力的众多问题之一。

面临以上的这些挑战,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二任期中有可能会放弃制定一个大战略的努力。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曾说,在“当今这个多极、多层级的世界中,美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办法围绕什么固定的主轴来展开”。因此,他断言,奥巴马总统没有办法在一个单一的宏观规划下来调和其各种政策,以应对对美国利益的无穷无尽、多种多样的挑战。相反,在扎卡利亚看来,总统更应该以一种务实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³然而,对美国而言,采取一种务实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导致政策的不一致性,鉴于美国覆盖全球的能力及其对他国的历史承诺,这种不一致性就有可能反过来造成全球安全困境。奥巴马的“导师团队”自然明白这一点,这促使这位观察者最终还是预期,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总统会努力地阐释一条符合政策一致性的战略道路。

奥巴马总统没有办法在一个单一的宏观规划下来调和其各种政策,以应对对美国利益的无穷无尽、多种多样的挑战。

(吴蓉 译; 仵胜奇 校)

1 James Brown, "Chuck Hagel and the Asia Pivot," *The Interpreter*, January 8, 2013,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3/01/08/Chuck-Hagel-and-the-Asia-pivot.aspx>.

2 Hirsch, *Ibid.*

3 Fareed Zakaria, "Stop Searching for an Obama Doctrine," *Washington Post*, July 6, 2011,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11-07-06/opinions/35237315_1_foreign-policy-obama-doctrine-monroe-doctrine.